

全·球·创·新·竞·争·研·究·丛·书

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动态能力报告 (2012)

程惠芳 唐辉亮 陈超 著

 科学出版社

全球创新竞争研究丛书

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动态能力报告
(2012)

程惠芳 唐辉亮 陈超 著

浙江省人民政府课题研究成果
浙江省科技厅课题研究成果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浙江工业大学国际贸易重点学科研究成果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浙江省长三角创新管理研究院研究成果
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浙商信息中心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探讨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评价的专著。本书选择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提升能力、经济国际化发展能力和节能减排能力等指标作为衡量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的指标,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转型升级综合能力进行比较分析,对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浙江11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也进行了初步探索性的评价。本书旨在为经济转型升级能力理论研究、经济发展转型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书读者对象为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政府有关领导和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动态能力报告(2012)/程惠芳,唐辉亮,陈超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全球创新竞争研究丛书)

ISBN 978-7-03-033626-2

I. ①开… II. ①程… ②唐… ③陈…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9289 号

责任编辑:王京苏/ 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年3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1/4

字数:320 000

定价: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历

程惠芳，浙江省东阳人，浙江大学经济学硕士，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2009年任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现任浙江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工业大学浙商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长三角创新管理研究院院长，浙江工业大学国际贸易博士点负责人，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贸易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国际贸易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家精品课程（国际贸易实务）负责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国际贸易）负责人，浙江省级教学团队和省级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负责人，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金融工程学会理事长，浙江省民营企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会长，第八、第九届浙江省政协委员。2001年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高级访问学者，200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主持完成科技部、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30余项，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管理世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10多部。作为第一负责人，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特别奖1项、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3项、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奖二等奖1项，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1997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和重点资助对象，2003年获“浙江省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和“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06年被评为浙江省十大杰出女性，200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9年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8~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前 言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创新驱动和协调发展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一轮重要发展阶段。在科学发展新阶段中，经济转型升级具有中国特色和深刻内涵，既包括宏观层次的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包括中观层次的产业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还包括微观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宏观层次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经济内外协调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中观层次的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协同发展转型。微观层次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是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这一轮经济转型升级具有战略性、系统性、创新性和挑战性的特点，是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向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现代化、经济国际化、生产清洁化、服务社会化方向转变的过程，经济转型升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以往国内外学者一般以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来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国和穷国。一般来说，人均国民收入提高与福利水平改善具有同步性，但是在现实经济发展中，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并不一定能够实现人民福利水平的同步提升，人均国民收入提高还可能与物价水平提高、人们劳动时间延长和闲暇时间减少、环境污染恶化有关。因此，仅仅以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是有明显缺陷的。

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的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而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是要处理好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础，其基本要素是人的生存、自尊和自由。生存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相联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满足人民的住房、衣服、食物和最低限度的教育等基本需要。自尊与生

活工作环境相联系，经济发展要使人民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消除被统治、被剥削和依附的地位。自由与人的生活和工作选择权和选择空间有关，经济发展要使人民更加自主、更大范围地选择工作和生活方式。因此，判断和评价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和绩效的标准：一是经济转型升级要以人为本，通过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人民生存、自尊和自由的能力，不断拓展人们对生活和工作选择时空范围，让广大劳动人民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让人们感觉生活成本低了，生存压力小了，幸福指数提高了。当然要达到这些要求非常不容易，需要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长期艰苦地共同努力。二是要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能力，经济转型升级不仅要促进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协同调整，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增长，促进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而且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更加关注当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更加关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如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协调，没有科学价值观指导，没有科学理性社会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发展，我国很难从经济大国转变为世界经济强国。三是要切实提高创新能力，改善创新环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引导企业从投资驱动和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基于创新的内生增长。

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践经验，经济发展转型可以分为封闭型经济转型和开放型经济转型，也可分为内生性经济转型与外生性经济转型。内生性经济转型是指通过自主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本国市场竞争力量推动经济转型，内生性经济转型是一种渐进式的转型，经济转型过程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外生性经济转型是指政府通过改革开放和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转型。外生性经济转型实际上就是开放性经济转型，开放性经济转型主要通过政府改革经济体制，实施开放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推进战略性经济转型，通过开放经济政策，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国际市场竞争力量推动本国经济转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型是开放性经济转型的模式，主要是通过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和开放经济政策引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全球范围的创新资源，通过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来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开放性经济转型通过政府的政策力量、国内外市场竞争力量和科技创新力量相结合，实现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济增长向集约经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增长转变；工业结构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变；技术创新模式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实现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相协调，实现投资增长、消费增长和出口增长相协调，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从

而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农业升级,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化、高技术产业化、高附加值和高端制造业方向升级,传统服务业向现代化、标准化、品牌化和高效化升级,持续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创新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改善和扩大人们的生存发展的条件和空间。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企业正在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及时了解全国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变化趋势,客观评价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效,引导与支持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转型升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任务。目前国内对有关经济转型升级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是对经济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和能力指数比较研究的成果还很少见。本书认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的指标应该包括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提升、经济国际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因素,因为基于上述方面的经济发展转型才能不断扩大人们的生存空间,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扩大人们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空间。因此,本书选择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提升能力、经济国际化发展能力和节能减排能力等五个方面指标作为衡量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指数的指标,并对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转型升级综合能力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旨在为经济转型升级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根据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除了对全国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进行了初步探索性的评价外,本书还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浙江省 11 个市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进行初步探索性的评价。在此想强调的是,本书中的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只是学术探讨的初步成果,我们只是想在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基础水平差异很大,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评价数据处理和评价方法还很不完善,因此评价结果也可能存在误差和遗漏,请读者批评指正。尽管我们在经济转型升级评价中的数据大多数来自于国家权威发布的统计年鉴,但是也可能在数据处理中出现误差和遗漏,如果由于我们的误差和遗漏,造成有关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的排序结果不理想,请有关地区批评指正,并希望得到谅解。因为这只是一本有关经济转型升级的学术探讨的书籍,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学者们对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的学术交流和深化研究。

本书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体系研究的动因来自浙江省政府有关 146 家工业龙头企业发展转型的研究课题。2009 年笔者受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同志的委托,接受对浙江省 146 家工业龙头企业转型升级的监测评价研究工作,在对企业进行调查和研究分析过程中发现,企业转型升级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企业的战

略和行动，还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企业所在地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环境条件。于是笔者和笔者的博士研究生唐辉亮、陈超、潘申彪、丁小义、胡军、杨阳等在2009年10月开始讨论和设计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初步完成后曾经组织过小型讨论会，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学忠、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浙江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盛世豪、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党组书记陈荣、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谢晓波等对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2010年1月我们开始收集数据，并对3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3~2008年的数据进行初步计算，在2010年11月初步完成了第一份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评价报告，2010年12月初向有关新闻媒体发布评价结果，感谢新华社记者李亚彪、中新社记者柴燕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卫视记者夏学民、浙江经视记者柴伟刚、《今日早报》记者魏皓奋等对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进行了报道。2011年以来，我继续对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数据和方法进行完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唐辉亮和陈超付出了不懈努力，在数据统计分析过程中，潘信路和潘望也做了大量核对和校对工作。研究团队为了计算数据和核对数据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终于完成我国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的评价报告。为了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对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方法进行讨论和交流，我们决定出版该报告，供大家讨论和批评指正。

在经济转型升级研究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副省长毛光烈、原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原浙江省副省长、现浙江省人大副主任金德水等领导的鼓励和支持，得到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舒国增、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孟刚、李学忠和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姚民声、浙江省科技厅厅长蒋泰维博士、浙江省教育厅刘希平厅长、汪晓村副厅长等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浙江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包纯田、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潘圣明的支持和鼓励，在研究过程中得到浙江工业大学领导和经贸管理学院领导及国际贸易学科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对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领导、专家和媒体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当然，本书中如有误差和遗漏都是我们作者的责任，与所有支持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领导和朋友无关。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我们对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讨阶段，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谨致真诚感谢。

程惠芳

于浙江工业大学浙商创新发展研究院

2012年2月10日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经济发展转型的论文文献回顾与分析	1
1.1 经济发展转型的内涵变化	1
1.2 宏观层次的经济转型的论文文献回顾	4
1.3 中观层次的经济转型升级文献综述	8
1.4 微观层次的经济转型升级文献回顾	9
1.5 经济转型升级绩效与能力评价体系文献回顾	12
1.6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历史沿革与理论创新	14
第 2 章 中国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转型升级动态能力比较分析	20
2.1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力比较分析	20
2.2 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分析	32
2.3 产业转型提升能力比较分析	43
2.4 经济国际化发展能力比较分析	47
2.5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能力比较	52
2.6 本章小结	59
第 3 章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综合能力指数及其评价	62
3.1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的指导思想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原则	62
3.2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63
3.3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评价指数的计算模型与方法	65
3.4 2003~2010 年中国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 指数排序	69
3.5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的综合评价结果 分析	85
3.6 本章结论及建议	90
第 4 章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分项能力变化分析	92
4.1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力变化	92
4.2 科技创新能力变化	95
4.3 产业转型提升能力变化	97

4.4	经济国际化发展能力变化	100
4.5	节能减排能力变化	103
4.6	本章小结	105
第5章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年度评价分析	108
5.1	2010年度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分析	108
5.2	2008年度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分析	120
5.3	31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年度评价分析	130
第6章	长江三角洲地区16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分析	160
6.1	长三角16市经济转型升级综合能力评价	160
6.2	长三角16市经济转型升级各项能力评价	162
6.3	长三角16市各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分析	167
6.4	本章小结	182
第7章	珠江三角洲地区9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分析	184
7.1	珠三角9市经济转型升级综合能力分析	184
7.2	珠三角9市经济转型升级分项能力评价	185
7.3	珠三角9市各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分析	189
7.4	本章小结	197
第8章	浙江11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分析	199
8.1	浙江11市经济转型升级综合能力分析	199
8.2	浙江11市经济转型升级分项能力分析	200
8.3	浙江11市各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分析	205
8.4	本章小结	214
第9章	经济转型升级政策支持体系	215
9.1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体系	216
9.2	加快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	217
9.3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建设	219
9.4	加快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	220
9.5	加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21
9.6	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223
参考文献	225
附录	若干省市“十二五”规划发展转型战略目标与主要任务(摘要)	231

第 1 章 经济发展转型的论文文献回顾与分析

在全球创新竞争的背景下，经济发展转型已成为当前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成为企业和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对国内外有关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脉络，进一步理解和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过程和客观规律。

本书对国内外有关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展开。宏观层次主要从国家经济体制与经济形态层面来研究经济转型，国内外学者重点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观层次则主要研究产业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微观层次主要研究企业创新发展模式、企业战略转型、企业商业模式转型等方面。本章对有关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文献进行初步回顾与分析。

1.1 经济发展转型的内涵变化

经济发展转型的内涵随着经济转型理论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和拓展，目前有关经济发展转型的内涵包括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ition 或 transformation）、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升级及体制转型等。

1.1.1 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通常是指一种经济形态或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形态或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的过程。在国家层次上，经济转型一般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封闭经济体系向开放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对国家层次上的经济转型（或称为经济转型国家）有比较多的研究，经济转型国家通常是指经济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尤其是指苏联、中东欧国家、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层次上的经济转型主要是由科技创新战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来推动的。

1.1.2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从主要依靠资源、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方式向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致

力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报告中提出：“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我国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换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1.1.3 经济转型升级

经济转型升级当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热门词汇和热点研究领域。在国外的经济学文献中并没有经济转型升级术语，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是分别进行研究的，当前我国提出的经济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本书认为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的进一步深化，经济转型升级内涵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向科技创新驱动、企业现代化、产业现代化、经济国际化、生产清洁化、服务社会化方向转变的过程，经济转型升级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为了实现

开放经济内外均衡发展,为了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转型升级是复杂系统工程,是持续动态变化的过程。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内涵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发展。

1.1.4 体制转型

国内外有些研究认为“转型”不仅仅指经济转型,热若尔·罗兰(2002a; 2002b)把转型理解为“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转型意味着“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或转变为另一种国家或政体”。柯武刚和史漫飞(2000)认为“转型是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控制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产资源为主的一种制度变革”。杰弗里·萨克斯等(2003)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转型。而雅诺什·科尔奈(2005)则认为“转型是一个大概念,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2000)特别注重政治在转型中的作用,认为“转轨最具有挑战性的方面是与政治的联系更甚于与经济的联系”,“转轨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带有政治特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开明的政治领导以及改革派人物的坚定决心”。他认为“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要有良好的宏观管理,政府应当重新定位,而不是被抛弃,而是应当转换角色,在适度管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则建议重新界定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认为社会文化在转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经济发展转型与产业升级而言,则主要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来展开,经济学家配第和克拉克提出产业结构升级至少包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高效化两个层次。波特提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由于要素禀赋的相对比重变化,促使生产移向资本较为密集环节的过程(Porter, 1990)。Gereffi(1999)引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模式,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经济体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有些学者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分析了产业升级的过程,经典理论有费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Hausmann和Klinger(2007)指出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与该国的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有关,提出了比较优势演化理论。

因此,经济发展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要素禀赋差异的国际分工理论、对外投资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以及技术创新理论。

由此可见,经济转型升级的概念内涵应该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因而新经济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和产业升级理论构成了指导经济转

型升级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经济转型升级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转型升级主要包括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模式转变问题，其实质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即主要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在提高效益和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包括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在内的全面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另一方面，产业升级是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包括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工业向新型化和高端化，服务业向现代化和高效化推进的过程。

1.2 宏观层次的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文献回顾

对于宏观层次的经济转型研究，国内外学者开始的研究一般把它理解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为代表人物的“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的三大重要支撑为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化。然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东欧和俄罗斯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研究者逐渐意识到经济转型不仅仅是像“华盛顿共识”所侧重的价格与市场的转型，还应该包括法制、社会与政治环境等方面。这使得对转型经济的研究得以深入到制度层次，制度构建成为进一步深化转型经济的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而导致了演化-制度学派的兴起，该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格泽戈尔兹·W. 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环境保护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成为经济转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学者们对经济转型的研究以开放的视角逐渐分化为体制转型和开放经济发展，既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又要实现经济从粗放型增长逐渐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并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Greenwood and Seshadri, 2004；Sun and Liu, 2010）。普遍的观点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经济转型的初期，面临的重点是市场机制的构建，侧重于经济体制的转型，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经济体制转型与市场化问题；到了经济转型的后期，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和国际化问题。因此，当今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倾向于市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

国际上经济转型理论研究把转型分为两个主流：第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计划经济国家进行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第二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向以追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为主创新驱动力的创新内生增长转型。

1.2.1 市场化经济转型相关理论

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包括：①内部市场自由化；②外部市场自由化；③便利私人部门进入。对第一次转型思考的焦点是市场化和自由化的速度，出现激进式与渐进式两种转型战略的争论。前一种战略又称“休克疗法”。

20世纪80年代末，萨克斯对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休克疗法”。萨克斯认为，东欧国家深受需求过度之害，其根源在于体制；对于经济改革的争论应当放在转变的方式上，而不是在转型目标上；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采取果断而迅速的行动，实行一步到位的激进的转型战略；西方的财政援助对东欧实施激进体制转轨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休克疗法”在东欧和俄罗斯实施的结果大大低于该方案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的期望值，缪瑞尔对激进的改革模型提出了批评，认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应采取渐进的方式，以减少改革的成本（Murell, 1992）。改革者应该去干那些应该干且能够干的事情，而不是像激进改革者那样急于求成，以改革的终极目标为参照系，排斥中间状态的出现。改革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改革的策略是应该并且也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

麦金农（1997）认为转型过程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特别重要，他尤其强调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必须减少预算赤字。在提到财政不平衡时，他强调有必要控制通货膨胀，而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条件，他建议放松外贸控制。对于麦金农来说，改革次序是很重要的，在国内金融改革之前应实行财政控制，在放开国家对外贸的干预之前应先实行统一的汇率，放开国内价格的管制应与放开外贸同时进行，但只有在紧缩财政和加强货币控制之后才能实行。

爱尔曼认为世界范围内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步，即从根植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经院式思想中解脱出来，转而开始研究转型国家的实际经验，他认为中东欧和苏联地区的转轨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法是：第一，公司治理问题；第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第三，建立稳固的银行体系；第四，减少腐败和犯罪；第五，要完成全面私有化的进程。政府应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人民群众对经济转型前景充满信心。

1.2.2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关理论

1995年以来经济转型以追求经济稳定增长为主线。这次转型过程重点是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依赖关系、企业重组问题和法律规则制定等。相应的理论焦点演变成市场化的目标模式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此给予了精辟的诠释和解答，从而使自己的转型理论成为第二次转型的典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1995年以来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转型理论，颇具特色，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7a）强调转型国家在理论上必须破除关于“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六个神话的羁绊，用“新的信息经济学解释经济运行”。在确立市场化的目标模式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认为，新古典市场经济模式即使纳入了政府行为和政府干预，也不能作为转型的目标模式。在转型稳定模式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张全新的转型理念，即把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相统一，其中主要内容，一是追求金融稳定，二是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政府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7b）认为至少在六大方面政府责无旁贷，第一是促进教育；第二是促进技术改善和保护技术专利，以鼓励创新和技术升级；第三是支持金融部门；第四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第五是防止环境恶化；第六是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斯蒂格利茨（1997a, 1999a）特别强调信息的重要性，他认为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备会对市场有效性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b）把知识也看作一种信息，认为知识的使用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体制转型的过程有重大影响。

关于经济转型的顺序和速度的安排，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7a）提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建议。在经济转型的顺序安排问题上，他建议：“首先放开价格以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其次，应像中国那样，在进行产权改革和私有化之间先进行市场改革，在上述两个转型步骤完成之后进行民营化改革。”在转型速度或转型方式问题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赞成渐进式过渡。他认为，渐进方式的可取性有两个理由，一是强调政府在改革中要承诺不轻易扭转改革方向，二是强调学习型组织、经济转型中的学习与调整。

1.2.3 国内有关经济转型理论文献回顾

我国学者围绕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以市场化改革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吴敬琏（2005）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源于传统的经济体制，这个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就是政府干预太多、市场不健全。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市场化改革，通过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非市场因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坚持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切实地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以及支持市场经济的其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经济转型重点是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以厉以宁（1996）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发展转型中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

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主体地位的经济体制；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基本合理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 and 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

常修泽（2010）认为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60 多年的时间里，已经经历了两波历史性的转型，并向整体或全方位发展模式演进。常修泽（2010）认为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在 1949 年转变到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1956 年又转向苏俄式—斯大林模式，这是中国的第一波转型，叫社会制度转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对的，而且是创举；但后来又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转向斯大林—苏俄式的传统制度，有挫折、有教训。常修泽（2010）认为第二波转型以 1978 年的 12 月 18 日作为标志，这天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个重大的历史决策，这场转型叫做经济体制转型。从历史长河来看，这一波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当初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战略任务还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有些当初定的攻坚之战还没有攻下来。比如说，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到今天恐怕都很难说已经破题。除了垄断性行业改革以外，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和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等改革也没有到位。常修泽（2010）提出未来 5~10 年中国发展转型的思路，认为未来几年经济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一是经济阶段的变化，即由前一阶段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为主要诉求的“生存型”阶段转向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阶段；二是传统的低成本粗放型工业化模式进入调整转型期；三是城镇化将延续快速发展态势；四是体制改革将呈现新的亮点，除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要从单一经济体制改革向“多向度”改革拓展，坚持对外开放，与外部的经济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包括两岸经济关系。常修泽（2010）认为中国未来几年发展转型基本方略是：人本战略，即由“物本导向”到“人本导向”；绿色战略，即由“环资启蒙”到“生态社会”，包括向技术要绿色、向结构要绿色、向政策要绿色、向市场要绿色；创新战略，即由“加工基地”到“创新高地”；协调战略，即寻求内外、产业、区域和城乡四大协调。中国发展根本在于体制的转型，由“经济转轨”拓展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价值先进化和多元化、生态文明化的“五环改革”。

国内还有很多著名学者（林毅夫、刘国光、高尚全、王洛林、李杨、何凡、王一鸣、刘志彪、王小鲁、史晋川）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

局面”的五个基本要求：“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1.3 中观层次的经济转型升级文献综述

对于中观层次的转型与升级，主要涉及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研究。在经济发展史上，经济学家配第和克拉克首次提出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的变化规律，他们通过对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分析，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至少包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的高效化两个层次，即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变化的演进过程和主导产业经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更替过程，后经库兹涅茨（Kuznets）、钱纳里（Chenery）等人的深入研究，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标准总结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特征及工业化发展阶段，从而揭示了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结构演变升级的规律性。国内外学者沿着这一研究思路进行了大量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如徐冬青（2007）总结了韩国产业升级的五个阶段：进口替代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阶段（20世纪60年代）→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工业阶段（20世纪70年代）→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高技术

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类似的研究还有李晓娣（2006）总结了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发展的五个阶段。波特提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比重随着资本累积及人力资本的提升而变化，促使生产逐步移向资本较为密集环节的过程（Porter, 1990）。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或地区与外部环境发生了物质、资金、技术和信息的交流，其结构的维系与变动不仅受到国内或地区内各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因素的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需求和供给结构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传导机制传递到该国或该地区，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因此有些学者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分析了产业升级的过程，经典理论有费农（Venon）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Kojima）的边际产业理论。Blomstrom在他的文章《FDI在日本经济调整中的作用》（2005）中利用数据模型验证了产业海外转移对日本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作用。有些学者还分析了产业转移对移入地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也产生影响，马库森（Markusen, 1997）认为产业转移到另一地后，会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带动相关产业的需求，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小泽辉智认为产业转移是一种“比较优势寻求”，因此会促进双边贸易的增长，最终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Ozawa, 1992）。

1.4 微观层次的经济转型升级文献回顾

微观层次转型升级研究主要从企业转型升级类型、路径选择、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对于企业转型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但至今对企业转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组织学家贝克哈德从组织行为学角度将企业组织转型定义如下：企业组织转型是“组织在形式、结构和性质上发生的变革”。莱维和默瑞将组织转型描述为一种彻底的、全面的变革，认为“组织转型需要解决组织的核心流程、精神、意识、创新能力和进化等方面的问题”（Levey and Merry, 1986）。巴图克认为：组织转型是一种发生在组织对自身认识上的跳跃式的变革，并伴随着组织战略、结构、权力方式、模式等各方面的变化（Bartunek and Louis, 1988）。吴家曦等（2009）认为：一般来说，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从转型和升级两个层面来理解，转型就是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即企业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换和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转变，前者表现为转行，后者表现为转轨。王吉发等（2006）认为：狭义的企业转型往往是自身在所处行业的竞争能力降低和竞争优势的衰退促使企业通过组织等的变革，提升企业在产业内的能力；或者所处行业的衰退，企业发展前景黯淡，迫使企业不得不主动或者被动地采取产业转移的战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企业获得新的生机，这种行业间的转移，可能是企业保留原有行业的业务，实行多元化的策

略，也可能是完全退出原有行业，全部进入新的行业，从形式上看，企业转型属于战略转换。

Gereffi（1999）将企业升级概念引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模式，认为企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Humphrey 和 Schmitz（2000）认为，从企业层面来讲，升级是指企业通过获得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改善其竞争能力以及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Poon（2004）指出企业升级就是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价值产品转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一种经济角色转移过程。Humphrey 和 Schmitz（2000）从价值链的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企业群有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间的升级四种不同类型的升级方式。国内学者唐海燕和程新章（2006）从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三个层面研究了温州打火机企业的升级路径；毛蕴诗和吴瑶（2009）通过对九个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典型企业的案例对比研究，总结了企业贴牌生产（OEM）→设计制造（ODM）→自主品牌（OBM）转型升级的演进路径。

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将影响因素分为企业内部因素和企业外部因素，对企业内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资本积累、生产运作模式、企业营销服务能力、企业自主创新等方面；对企业外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与成本上升等外部环境的压力、政府政策的推动等方面。Carayannis（2004）认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因素包括资金的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等；Gans 和 Stern（2003）以及 Vergrat 和 Brown（2006）认为政府大力营造良好技术创新环境，有利于企业快速实现转型升级；Gries 和 Naude（2010）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来研究创业型公司的创新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国内学者王一鸣和王君（2005）指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主要是受到企业盈利水平和投入能力、创新收益、创新人才、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制度等内部条件的制约。综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实质上就是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企业的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密不可分。

程惠芳（2009）认为由于各个企业的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不同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能力、转型升级过程、转型升级的战略和目标是不一样的，在企业层次上研究和评价企业转型升级首先要对转型升级进行分类。她在对行业企业的调查中发现转型和升级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企业转型升级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推动和实现，但企业转型主要与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相联系并靠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推动和实现。而企业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则更主要靠技术创新来支撑和推动。因此，需要对转型和升级的差异进行一定的分析和分类。

企业转型可以定义为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从初级管理运行状

态向比较完善的管理运行体系转变的过程(程惠芳, 2009)。企业运行状态的转型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一是企业管理模式转型, 即从老板自己管理企业向委托职业经理人管理转变, 在管理模式转型中必须要进行管理制度改革和管理制度创新; 二是市场营销模式转型, 即从传统的批发零售向发展国内外市场营销网络和电子商务转变, 形成具有特色的商业模式, 市场营销模式的转型必须要对原有的市场营销的管理体系和商业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 三是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型, 即从私人企业或家族企业向上市公司的公众企业转型, 在上市过程中企业的股权结构、财务制度、信息披露等管理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 四是企业发展模式转型, 即企业从单一加工制造向设计、研究开发、制造、销售、自主品牌发展转变, 企业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职能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 五是企业发展层次转型, 即企业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向追求企业可持续发展转变, 从只考虑企业利益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转变, 企业商品销售、投资和资源配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转变或者出口企业在金融危机后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 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必然要进行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因此, 企业转型往往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及管理创新有关。企业转型的内在推动力量是企业新的发展战略的需要, 或者是为了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突破原有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障碍的一种内生制度创新动力。企业转型的外在推动力量来自于政府推动和市场竞争的驱动。政府推动企业转型可以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两个层次。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 为实现国家战略通过对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来引导企业进行转型。地方政府为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也会通过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为企业创造转型的环境条件, 并引导和要求企业进行转型。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会迫使企业转型。企业转型是企业为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进行的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是市场竞争和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

企业升级“是指企业的产品、技术、品牌等从比较低的等级升到比较高的等级的过程, 企业升级与企业管理制度、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具有紧密的联系, 但企业升级的主要支撑力量是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企业升级的过程就是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水平提升的过程。在相同的市场竞争条件下, 企业升级的能力和速度主要是由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决定的。企业升级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一是产品升级, 从低附加值或低质量的产品向高附加值或高质量的产品提升, 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升级, 从单一产品向多元产品系列提升, 提高企业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二是过程升级, 从传统制造生产过程向自动化信息化的先进制造过程转变, 降低成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技术创新升级, 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提升, 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提升。四是品牌升级, 从没有自己的品牌提升到具有著名品牌, 从省级品牌提升到国家品牌或国际品牌。五是企业发展层次升级, 从区域著名企业向全国著名企业、国际著名企业

提升，企业层次升级要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水平来支撑。因此，企业升级主要由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推动，技术创新对企业升级的推动力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内在的技术创新能力、政府为企业创造的技术创新环境、市场竞争状态和产业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程惠芳，2009）

程惠芳认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涉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诸多因素。企业的转型升级的过程是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互动的过程。这种互动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互动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二是政府层次上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不仅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创新的环境和政策支持，而且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框架，是企业升级的环境条件。三是政府与企业转型升级中的良性互动是转型升级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条件。企业转型升级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创新系统，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是政府的创新推动力、市场竞争的拉动力和企业谋求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形成合力的过程。企业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能否取得显著成效不仅取决于三个层次互动是否形成，还取决于三个合力的大小及合力形成的速度。企业转型升级是企业 and 政府的创新互动过程，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动态变化过程。企业转型升级动态变化的成效不仅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创新能力有关，还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技术创新工程体系建设、政府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力度等转型升级的环境条件有关。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转型升级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总体来说经济转型升级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是长期动态变化的过程。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是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科技创新和政府政策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5 经济转型升级绩效与能力评价体系文献回顾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发展转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评价体系的研究却比较少，目前与经济发展转型评价相关的量化指标体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5.1 转型经济体市场化程度的指标体系

这类指标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出的改革进展指数评价体系（IRP），该指标体系主要是围绕市场体制来设计的；②1996年世界银行关于经济转型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世界银行对转型绩效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市场自由化、产权和企业改革、机构和社会改革三个方面；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对转型绩效的评价,在绩效度量上不仅注重制度结构改革的进度,而且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的经济效果,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GDP变动情况作为重要指标;④原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转型绩效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选用企业自由度、国内开放度、对外开放度和宏观调控度来衡量市场经济度;⑤卢中原和胡鞍钢(1993)主要从投资、价格、生产、商业四个方面进行评价;⑥常修泽和高明华(1998)主要选取产品的市场化、要素的市场化、企业的市场化、政府的市场化和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五个方面;⑦陈宗胜(1999)对经济体制主要构成部分、主要产业部门、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⑧樊纲等(2003)通过构造市场化指数分析了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的相对进程与差距;⑨杨晓猛(2006)基于产业结构调整指标的设计与评价分析了转型国家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差异。上述这些评价指标体系,最大的优点主要是考察和测度了转型经济体的市场体制改革绩效,但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环境保护没有给予充分重视。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虽然体制转型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但与现代化、国际化相关联的经济发展问题逐渐取代体制转型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以市场化进程为考察目标的评价体系已经不能正确反映当前的经济转型升级绩效和能力。

1.5.2 经济增长质量测度体系

经济增长质量测度体系主要有两类:一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沈坤荣,1998;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俞安军等,2007),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常被归因于技术进步,因而这只能是一种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二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学者们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环境质量等方面设立指标体系(钟学义等,2001;李岳平,2001;彭德芬,2002;赵英才和刘海英,2006;申世军和郭凯生,2007),但这些研究由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与内涵缺乏清晰统一的标准,在指标的选取上可比性不强。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虽然通过理论模型推导界定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但在指标选取时没有考虑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主要形式的国际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且没有说明是用哪一年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权重获取的,显然各级指标随着时间的积累导致权重的合理性会出现偏差。

1.5.3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体系

目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代表性的有:舒元和王曦(2002)从经济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国家竞争力五个方面构造的指标体系,但遗憾的是该指标体系只是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无法了解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状况;沈露莹(2010)

从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以人为本六个方面构建的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只是针对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来设立指标，不具有普遍性；李玲玲和张耀辉（2011）从经济增长、发展动力、资源环境支持、发展成果四方面构建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虽然较好地总结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对全国的总体状况进行测度，但对全国各省市的状况和差距没有进行分析，此外，在权重的获取上均采取了专家打分的方法，这种获取权重的方法由于主观性太强，其科学性值得推敲。为此，本书将通过构建一套相对科学的指标体系和客观赋权的方法来评价全国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及其差异性。

1.6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历史沿革与理论创新

1.6.1 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沿革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经济转型升级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经济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期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经济体制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其实质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轨，是一种经济制度的转轨，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相当于由半市场经济直接转向计划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受苏联模式以及赶超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走上了主要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追求数量的典型粗放型发展道路，在这一阶段虽然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比较落后，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

2. 第二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型期（1979~1992 年）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发展的新时期。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的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和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思路，在重新考察了以往的高速度、高指标、低效率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后，决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进行调整，但直到 1980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才明确提出要走一条经济效益较好的新路子，由此标志着中央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步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1982 年的中共十二大提出了“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但还没有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直到 1984 年 10 月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提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为经济体制改

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探索阶段,由此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在这一阶段的体制变革又可大致分成两个时间段:1978~1984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传统体制内部改良和在传统体制边界上培育市场化因素启动改革,改革均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并没有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1984~1992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市场规模化扩张,形成了以“价格双轨”为代表的体制双轨运行时期,1984年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为在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经济转型的启动、程序设定以及转型道路确认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主要围绕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共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改组和联合,有重点地开展企业的技术改造”;十三大提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十四大提出“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这一时期虽然已经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思想,但在党的相关文献政策中还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

3.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转型阶段(1993~2006年)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开启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里程碑。在这一阶段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构建与逐步完善,更多探讨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保障、宏观调控方式以及市场价格机制的转型。同时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后,1995年在中共十四大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实行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与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是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提法,标志着中国经济转型进入一个新阶段,且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再次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在这些方针实施多年后我国粗放型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未实现根本性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格局未根本改变,因此

在 2005 年中共十六大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又一次明确了加快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并要求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时期主要围绕由有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而言，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注点提升到了体制构架的高度，主要以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调控方式、市场运行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为主线进行的转型发展，同时在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开始注重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并提出了增强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内在驱动力。

4. 第四阶段：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阶段（2007 年至今）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开创性地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特别是在经历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政府、企业以及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 2010 年 2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工作提出了“八个加快”的意见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历史性新阶段。在 2010 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将通过转型升级逐步走上一条主要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包括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一时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开始更加强调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的“双轮”驱动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民生改善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把自主创新、循环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提到了较高的地位，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实现速度、质量与效率的统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

1.6.2 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以孙冶方、马寅初、元琰、萧禹功、喻良新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速度与比例、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社会主义再生产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其中孙冶方的《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载于《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和《从“总产值”谈起》(载于《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两篇文章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最早探索(张卓元,200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出现新现象、新问题,这就需要理论界提出新观点、新理论来指导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学者们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把理论研究重心转向了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转向了对改革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涌现了以诸如刘国光、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周叔莲、卓炯、蒋一苇等为代表的经济改革的倡导者、探索者和实践者,他们在商品经济理论、双重转型模式理论、企业改革理论、价格理论、稳中求进的改革理论等方面的经济改革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国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以及经济“两个根本性”转型奠定了理论基础。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则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该决定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此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宏观经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由此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模式的选择进入了选择企业改革主线论(以厉以宁等为代表)还是价格改革主线论(以张卓元等为代表)的思路的争论,最终中国选择了价格改革主线论的思路,形成了“价格双轨制”的稳中求进的模式。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2006年这一阶段主要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则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特征、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形式、社会主义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对外开放的战略以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问题,并对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等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浪费的问题日益暴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呼声越来越高,学者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刘国光和李京文，2001；吴敬琏，2005；王一鸣，2007；林毅夫和苏剑，2007；洪银兴，1999，2010），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研究（刘志彪和安同良，2002；钱方明和陈娟，2009）、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研究（凌文昌和邓伟根，2004；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研究（王小鲁，2009；卢艳等，2008；林勇和张宗益，2009），节能减排研究（蔡昉等，2008；陈诗一，2009），有关 FDI 与开放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研究（程惠芳，1998，2002）等。这些研究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

刘志彪认为产业升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它体现为产业结构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的演变趋势。从产业结构的演进中索取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思想，是产业政策的核心和精髓。对产业升级的动因的解释，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是从需求收入弹性变化和生产率上升两个角度进行的。它不仅浮于表面，而且忽视了为获取贸易利益而在劳动分工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即忽视了交易费用随劳动分工的扩大所呈现出的指数化增长趋势。对产业升级动因的分析，应该在经济主体追求分工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上，从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被大量引进商品生产过程的角度来进行。

金碚等（2011a）认为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重化工业粗放发展与能源和环境约束的矛盾突出、产能过剩问题呈现扩大趋势、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进展缓慢、自主创新对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不足、资本深化与增加就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是制约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他提出了推动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包括深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促进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条件；完善产业政策、遏制和治理产能过剩；优化产业组织政策，形成分工合理的企业梯队；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工业国际竞争力；强化技术创新政策，提升工业技术水平；健全节能减排政策，实现工业绿色转型。金碚（2011b）认为政府要把转型升级的创新想象空间更多地留给企业。第一，政府应该制定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划，这种规划是方向性和指导性的；第二，政府应制定基本的工业标准，这种标准主要应是“门槛”性的；第三，对于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的项目和行为，政府应该制定鼓励政策；第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有一些总体上的趋势，各个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选择必然各不相同，政府没有必要规定或者强求企业如何做，让企业发挥想象力。

刘志彪（2010）认为未来产业转型升级有两个基本序列：一个是制造业的升级，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固然重要，却不能化解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城市化的产业升级，即从传统制造业到现代服务业的升级，这一升级序列将创造出新的就业经济——白领劳动密集型经济。从蓝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白领的劳动

密集型从业，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模式，是外向型制造业“去产能”后的新经济。这两个产业升级序列的本质，都要求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经济——白领劳动密集型经济，由此突出了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创新经济中高级人才战略的重要和基本取向。

吴敬琏（2011a）认为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通过改革创建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而关键的关键又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抓住这一条，才能一通百通。吴敬琏（2011b）认为经济转型需要弄清三件事：第一件是要搞懂经济转型的理论；第二件是要组织好经济增长模式，每一个地方应该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状况，根据自己的产业链发展基础来确定自己增长转型的不同做法；第三件是政府怎么改善，在经济转型中，政府的工作就是职能转变，但是在全国的范围来看，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化使中国积极主动并快速地“嵌入”到产品内价值链分工的网络之中。基于价值链思路，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产业升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张耀辉（2005）对“产业升级”概念的内涵进行了仔细剖析，指出了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传统理解的积极意义，但产业升级的“真正含义应是高附加值产业代替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并提出，产业升级的过程实质上是产业创新与产业替代的过程，而产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主要方面。刘志彪（2011）认为以低级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GVC）来发展外向型经济抑制了企业对产业升级空间的自主选择，从事国际代工的企业很容易被国际大买家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从而进入代工的路径依赖；在高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低级要素嵌入GVC的新形势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虽然能够较快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却面临着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中、高层次的产业升级困境。这些以价值链为思路的研究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指导。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和发展要求等方面的理论探索，促进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以人为本以及全面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这一报告有力地推动了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主要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经济结构、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推进节能减排、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等方面。

第 2 章 中国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转型升级动态能力比较分析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企业正在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及时了解全国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变化趋势，客观评价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效，引导与支持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转型升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任务。目前国内对有关经济转型升级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是对经济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和能力指数比较研究的成果还很少见。根据党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精神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书认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的指标应该包括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提升、经济国际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因素，因此，本研究选择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提升能力、经济国际化发展能力和节能减排能力等五个方面的指标作为衡量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指数的指标，并对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转型升级综合能力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旨在为经济转型升级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2.1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力比较分析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力包括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和民生改善三方面指标，以地区 GDP、人均 GDP 和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经济发展，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来反映经济效益，而以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反映经济发展对民生的改善能力。

2.1.1 地区 GDP 与人均 GDP 水平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1978 年的 3645 亿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437 042 亿元（图 2-1）。以 2010 年地区 GDP 的规模来划分，处于第一层次的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第二层次的是河南、河北、辽宁、四川、上海、湖南、湖北、福建、北京，第三层次的是安徽、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广西、江西、天津、山西、吉林、重庆，第四层次的是云南、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2003~2010 年，地区 GDP 的规模排序有提升的是河南、辽宁、四川、湖南、北京、内蒙古、陕西、天津、宁夏等。地区 GDP 的规模排序不变的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安徽、重庆、